

# 无惧地解剖日本人的精神世界

## ——读《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

程兆奇

---

即使以最严格的“言论自由”的尺度来衡量,日本仍被认为是“完全的言论自由”的国家。然而,因为对战争罪行从未进行过全民性反省,因为明治以后深植于日本民众的天皇崇拜(Mikado-Worship)随着战败后天皇制的保留而免于遭受清算,致使谈论天皇战争罪责至今在日本仍有“违碍”(タブー)。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对天皇持议极严,他在后记中说:

天皇确实没有对大虐杀直接下手,也没有直接下令杀害俘虏,但他是大日本帝国的唯一元首,他是帝国陆海军的“大元帅”。满洲事变以后,日本军队的通称由“国军”变成了“皇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在天皇的名义下作为“圣战”进行的。这个“圣战”的方针,和藐视中国的意识相辅翼,消解罪恶感,将所有的残虐行为合理化。所以,天皇至少必须承担南京大残虐事件(アトロシティーズ)道德上的最高责任是毋庸置疑的。

在一个大众思想日益“法西斯化”(作者语)的国度里,面对滚滚浊流,作者所做的抵抗努力,尤其是作者的斩截态度,我以为都

---

见世界无国界记者协会历年报告,亦可参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有关报告。  
该书中译本由程兆奇、刘燕译,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6月出版。

是应该特致敬意的。这也是我将此书译介给国人并作此文的一个主要理由。

此书对天皇未稍宽假,一再强调他的不可推委的战争责任。不过此书的主旨不在于批判天皇,也不在于批判战时的统治者,如题所示,它也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批判——若以日本人为一体,也可以说自我批判,也不满足于一般的“历史”分析,而是“由表及里”从日本大众的“精神构造”下手探讨残虐行为的人性根源。正如作者所说:“我的问题意识是,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的‘善良的劳动者’、‘平凡家庭的父亲’、‘礼仪端正的人’之类日本庶民,到了中国战场会变得那么残暴。我觉得这仅仅以战场的‘异常心理’、通州事件讨仇,或者为了战死的战友报仇等等解释是不够的。我认为这是和‘日本大众特殊的精神构造’有关的。”

书中对日本大众的特殊“精神构造”有详细的论述和分析,此处只能略及大概。

## 庶民的算计和虚无主义

“南京大屠杀”,日本通称为“南京大虐杀”。洞富雄、藤原彰等别称“南京大残虐事件”,或迳用音译アトロシテイーズ,以之与Nanking Atrocities对应。《精神构造》一书亦多采“大残虐事件”或アトロシテイーズ。因为在南京发生的不只是屠杀,还包括强奸、掠夺等残虐行为,所以“残虐”较之“屠杀”确实更具概括力。解释这一“残虐”制造者的意识,迄今日本学界多取“战场心理”或所谓战场的“异常心理”的视角。对此,作者并不否认,但认为“南京大残虐事件”的诸相单用“战场心理”、“异常心理”来解释还不能溯其根

如洞富雄所编资料集即名之为《日中战争南京大残虐事件资料集》。

源。作者认为日本大众“即自”(ansich)的思想中已有残虐的胚胎,因而才会在侵略战争第一线的绝望体验中有那样的残虐表现,也才会在回到后方过上正常生活重新成了“善良的劳动者”、“平凡的家庭的父亲”、“礼仪端正的常人”时以自得的态度对残虐行为津津乐道。

战时流亡中国,在国民政府政治设计委员会工作的鹿地亘,早在1938年编著的《战争?日本军暴行录》序中,记录了他在东京警察署的一个同监,称此人“对道德的麻木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但同时又是“战功卓著的‘勇士’”。鹿地感慨地说:“我不能不想所谓‘勇士’是什么。这个男人平时言行的无羞耻,与战场上屠杀行为的丧失人性的大胆之间,我看不出任何道德的差别。东京的良民也好,大陆的住民也罢,在他眼里都是残忍的快举的对象。只是后者比起一般人来说更是支那人,在战场上更可以享有没有法律限制的自由处置的乐趣。”

鹿地亘是1935年10月保释出狱的。作者以为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鹿地已从一个“地痞”平时言行的无羞耻”所表现的精神状态中找到了“战场上屠杀行为的丧失人性的大胆的根据”。作者更进而指出:在南京大残虐事件中,不仅是这样的“地痞”,“东京的良民”以至日本整体的男性大众都是作为残虐的加害主体登场的。

战前右翼领袖之一的橘孝三郎曾在列车中听到“一伙纯朴的乡巴佬”的对话:“‘不管怎么说,日美战争快些打起来好。’那样的话,大概就会景气了。但能胜么?美国大着呢!’不知道。但日本军队是世界上最强的。’这当然,世界第一。但士兵世界最强,军队资金跟不上。’嗯……’饿着肚子可不能打仗。’这当然。不过管

它败不败的,打了再说。胜了当然是我方的,想抢多少就抢多少。败了,像美国这样的对手也没什么大不了。成了美国的附属国,说不定日子反倒更好了。’”

橘孝三郎“听了这伙纯朴的乡村老人的话,茫然若失”。记载此事的《日本爱国革新本义》,是“地下”非法出版物,出版日期是昭和七年,即“满洲事变”和“一·二八”上海事变稍后不久。时值“昭和恐慌”,日本都市中充斥着失业者,农村的困顿则以“卖女儿”(“娘身売り”)和“饥饿儿童”为象征。在这样的状况下,自暴自弃的心态就弥漫于找不到出路的人们中。上引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所以它虽只是一个孤例,但却是当时日本社会普遍心境的写照。

“纯朴的乡村老人的话”所示固非自觉思想,但大众思想的实态本以非自觉为常态。这些村夫的对话充分表现了当时日本大众在迷茫中的沉沦、无奈、实惠、势利、狡黠。作者将这种思想状况概括为“庶民的算计和虚无主义(ニヒリズム)”。他认为“在昭和恐慌下,虚无主义成了情绪发泄的出口,其最尖端就是利用‘军队’和‘战争’的寄生浪人意识的产生”。

作者还引用了不少战时日本士兵的阵中日记,其中不乏“缴获”战利品的内容。如果说“纯朴的乡村老人”从美国“想抢多少钱就抢多少”的想法多少还只是为了精神宣泄的打趣的大话,阵中日记中的“缴获”则是实实在在的掠夺和掠夺计划了。作者认为“所谓‘惩罚暴支’的‘圣战’方针,在此便和一个个庶民的算计——‘缴获’亦即掠夺计划——结合在一起”。“我不认为‘圣战’的方针可以和真正的庶民自我(エゴ)分开,也就是说,‘惩罚暴支’的口号,只

《日本爱国革新本义》,载《现代史资料》之五《国家主义运动》之二。

虚无主义(ニヒリズム)是作者在书中解释日本大众思想状况的关键词汇之一,其含义与中文略异,主要指在身不由己的环境里的自暴自弃的精神状况。

是日本大众的庶民利己主义(エゴイズム)在政治层面的形态化。而且,在这个庶民的算计的背后紧随着的是大众虚无主义的阴影”。

## 大众虚无主义和知识人的虚无主义

日本军在南京以至于在整个中国表现得极为“残虐”,更特别的是这种“残虐”常常表现得十分随意。众多的“阵中日记”对此有大量的记载。比如去年出版的中文版《东史郎日记》就记录了不少仅仅为了解闷的纵火和无意义的杀人。1937年12月4日这样记:“放火,近来对我们来说,实在已算不上什么事,比小孩玩火还有趣。‘喂,今天冷啊’那就烧幢房子暖暖吧!”1938年3月23日记:“苦力中有一个老人。他的长相冷漠而让人讨厌。荒山上等兵说:‘你的脸让人讨厌。你要是死了,就不会在老子面前晃来晃去了。’说完就是一刀。可能刺中了肺,口吐鲜血,挣扎了一会,死了。”这种对中国非战斗人员的毫无意义的杀害,作者称之为“不负责任的大众虚无主义”。

与庶民的非理性虚无主义不同,知识人的虚无主义表现出了充分的自觉。作者举了杉山平助的例子。杉山是有“社会良心”之誉的文艺评论家,1937年10月至次年1月曾有华北华中之旅。在南京陷落的年暮,他和朝日新闻南京支局的记者有过一次长谈。当时的情况,杉山记录在《支那和支那人与日本人》中。其中有这样的话:“我认为,战争一旦开始,为了胜利,为了确保战果,采取什么手段都是无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不仅无力,而且无能。今后

---

此为东史郎“阵中日记”的首次出版。以此日记为素材编写的《わが南京プラトーン》1987年由青木书店出版后,受到日本右翼的围攻。

的战争,区别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从严密的意义上说已不可能。迅速的歼灭也是一种慈悲。只是在这里还留有技术问题。残忍作为一种力量是不能不利用的。”

作者认为“杉山表明的是让人吃惊的能动的虚无主义。杉山作为知识人,彻头彻尾贯穿了自觉,其‘虚无主义’达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

杉山在同文中叙说了和抱着儿子的死骸痛哭的“支那”老妇的遭遇,并感慨地说:“几亿人的苦恼、呻吟,对自然来说,比一瞬的风更空洞。我们人类也许过于自大了!对自己的苦恼说得太多了,未免有点无聊了。所以我对这个眼泪满眶的支那人的苦恼,只是报以冷笑。奴隶的生命本不值一提,我们的生命也不值一提。当前,对我们来说,惟有努力,惟有豁出性命保卫日本。”

杉山平助没有丝毫人道的道德观,相反,有的只是由战争对弱者的抹煞。这就成了“大残虐”的理由。作者曾援彦坂谿《人是怎么成为兵的》所说的“大量杀戮的更大的罪过在于对每个人的价值的抹杀”,质疑“‘惨祸’的悲惨程度是由数字多少决定的,‘大屠杀’是以死伤者的量为基准决定的,没有明记这一量的文献便只能被认定是不存在的”。在引及杉山上语时,作者说:“大量杀戮的真正的犯罪性格是对人的价值、个人的‘烦恼和感叹’、个人的悲惨的完全的抹煞。上述杉山所说,不外是为大量杀戮找一虚玄的理由。”“这正是自觉的知识人的虚无主义的最后的语言。”

《支那和支那人与日本人》初刊于综合性杂志《改造》。而《改造》向有“进步”之美名,于此足可见战时日本全民性的精神堕落到了什么程度。

---

《支那和支那人与日本人》,载《改造》,1938年。

同上。

## 天皇崇拜和蔑视中国的思想

除了对与“大残虐事件”相关的日本大众意识层面的分析，作者还认为，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令人战栗的事态，“其中存在着由特殊历史造成的精神的原动力。惟有在这点上，天皇崇拜和基于此的‘圣战’思想与蔑视中国乃至中国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加上庶民利己主义，‘大残虐’在士兵个人的精神上便被日常化了。”

作者认为：明治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其形成的特殊性，与西欧的“古典的绝对主义”大不相同。西欧的古典绝对主义是经过罗马主教、教会和封建诸侯的激烈斗争的洗礼，通过自己的手确立政治权威的。与此不同，日本的绝对主义君主制是在维新变革的权力斗争中，由一方的政治势力将相对“自由”的传统权威天皇推为全国统一权力的首领而形成的。具体地说，也就是“对天皇尚有清醒意识”（鹿野政直《明治的思想》）的明治藩阀政府的指导者们，在古代、中世纪以来在日本大众中培养起来的对天皇和天皇家族的巫术崇拜（シャーマニズムの崇拜）和亲近的感情为契机，制造天皇的权威，由此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天皇制。”

即便如此，“为正统性自我辩解的体系的意识形态（君权神授说）发育得并不充分。因此而有以“天壤无穷”的“神敕”开始的天皇宗神话和传说。而且，日本的天皇制以这一神话为中轴，创造了自我辩解的“家族国家”观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它将父家长主义的“家”的原理直接扩大至“国家”，以天皇家为“臣民”的宗家，以天皇为“大御亲”；另外，将“臣民”虚构为所谓“赤子”，将国家比照为一个大家族。“这样的意识形态，无疑是从基于‘家’的原理的‘村’意识·乡党意识以‘天壤无穷’神话和儒教思想为媒介提升而来的。”“可以说，以对外侵略为契机‘村’意识不断提向了国家意识的层

面。于是,在日本,爱国心经常变形为排外主义的所谓‘忠君爱国’。”

“忠君爱国”的“圣战”意识的另一极是对中国乃至中国人的蔑视。蔑称中国人的所谓“ちやん”(呛)“ちやんちやん”(呛呛)“ちやんころ”(呛括咯)等语言,是甲午战争日本获胜后在日本流行的。但早在甲午之前,昔时那种对中国的崇仰已不复再见。鸦片战争后中国屡蒙西人之辱,日本人在震撼之余已萌轻视中国之心。

甲午后对中国的蔑视感已“全民化”,甚至连夏目漱石的作品中也频频出现“ちやんちやん”。像《坊ちやん》中主人公坊ちやん吵架时就有这样的科白,“如是日清战争的话,你就是‘ちやんちやん’了”。由此足可见国民感情的一般。作者引用了父亲的大量日记,日记中除了闻见观感外还附有不少剪报和书信,其中鄙中情绪随处可见。比如时在华北前线的作者的表哥从太原附近发出的一封信(1937年12月17日到,发信日期未载)有这样一段话:“在残破的墙壁上大书着‘抗日救国,山西的民众都起来参军’,道路两侧延续着深两米的战壕,驴慢吞吞地走着。到昨天为止还在高喊抗日的ちやんころ举着写有欢迎大日本的旗帜稀稀拉拉的走来。”作者说:“这里对‘ちやんころ’所表现的软弱、狡猾的蔑视感,我想并不只是我才会感到。父亲也接受着这一感情,为在前线作战的外甥感到自豪。”

作者总结道:“这样的对中国侮辱的思想、感情,除了极少数的先觉,已遍及国家的规模。而且‘圣战’的方针——‘暴支应惩’——和这一蔑视感相结合,以庶民利己主义发泄的‘大残虐事件’几乎使所有的官兵都没有抗拒感便接受了。我们是背负着这样的思想

---

依日本通常说法,19世纪中叶赴美的日本人,看到在西部筑路的华工——“猪崽”苟且于艰辛和屈辱,先是大感惊讶,续而便大加鄙夷。



史的现实,被定位于这一历史中的。”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著述,日本不少于中国,80年代以来专书便不下60种,但专从“精神构造”着眼仍是个别致的角度。作者的解释或非尽周,但分析入理,掷地有声。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昭彰事实至今仍受到公然的抹煞(虚构派)和佯奉实违的淡化(“客观”派),对作者所剖析的日本“国民性”恰可为以今证昔的一例。

(作者程兆奇,1956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刘兵)

### 上期更正

页数	行数	误	正
232页	4行	谓	未